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11期
2007年11月16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德国与中德关系发展前景

——“中国德国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李玲飞　黄雨果

2007年10月27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在开幕式上做了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德国新时期外交政策，并就当前德中关系危机等问题做了回答。在随后两天的研讨会中，来自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德国·欧盟·世界”这个主题，就新时期中德关系、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德国外交政策的定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坦率的探讨。

一、中德关系

自1972年中德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虽非一帆风顺，但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在建构21世纪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和德国都视对方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两国于2004年正式宣布，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建立中德之间“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在默克尔总理于2007年8月下旬第二次访华前夕，中国驻德大使和德国驻华大使分别发表讲话，指出中德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然而，时隔不到一个月，默克尔在德国联邦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这使两国官方关系陷入困境，被称为“历史上的严重倒退”。如何认识中德关系的当前危机与发展前景也成为了研讨会的首要问题。

德国大使在开幕式报告中主要阐述了德国新时期的“前瞻性外交政策”，但在回答提问时主动谈及默克尔会见达赖的问题。他认为，这里存在着文化认知差异所造成的误解：中国从政治导向来看待问题，认为达赖是一个分裂国家的政治人物；德国则以价值与哲学为视角，将达赖看成倡导和平的宗教领袖，在德国没有人意欲损害中国主权。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不同的认知和误解，双方因此应该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

不少中方与会者对上述解释并不认同，认为会见达赖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专家从个人因素与国内因素两个方面对默克尔接见达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默克尔的“东德”出身、早年经历以及“亲美”价值取向导致她持有与前任总理大不相同的国际战略观，对中国表现出诸多不信任姿态；另一方面，德国智库中鲜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学者，这使德国国内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德关系问题缺乏客观评价，对德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这两方面来看，默克尔接见达赖，并不是单纯的偶然事件。

另有学者从国际层面考察这一事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当前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背景之一，相形之下欧洲的发展速度较缓；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欧洲政治家明显缺乏进行国内改革的勇气，试图向外转嫁危机。有专家特别指出要注意如下趋向：“有一天，欧洲人会把所有困境的原因都栽在中国人头上，比如说是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德国价值观外交的根本立足点依然是国家利益，利益考量是影响中德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德中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多数与会者的看法并不悲观。有学者认为，两国对许多国际重大问题存在相同或相似的立场，都认为实行有效的多边主义合作才有助于保证全球和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再者，两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一种“并行不悖的相似或一致性”，如两国在建国后都曾坚持“单独代表权”，在20世纪60年代末都开始奉行“新外交政策”，在冷战结束后又都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崛起大国”（德国表现在政治上，中国则表现在经济上）。另外，德美关系也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德国对美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惟此惟大”的地位。加之中德两国间业已发展起来的全面、深入的各种双边合作关系，中德关系以发展为主流的状况不会有根本改变。

二、德国经济与社会

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优先目标，强调市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统一。如果按照经济学“魔力四边形”中“价格稳定”、

“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度增长”这四大目标衡量，德国经济在2006年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呈现出全面好转的趋势，并通过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遏制了今年9月美国次级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信贷萎缩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德国尽一切可能保持工资增长的适度，避免工资的高速增长打击经济发展。同时，德国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失业者的福利作了些许削减，以鼓励充分就业。需要注意的是，与红绿联盟“暴风骤雨”式的改革相比，黑红联盟的改革是“和风细雨”的。由于德国经济的复苏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选民对政府比较满意。权威问卷机构的调查显示，德国民众对大联合政府的中期评价为85分。

与会者认为，德国的经济模式与东亚模式各有特色，前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德国的经验主要在于：(1)实行社会福利大众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社会公平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做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循环。(2)在实行产业政策时，坚持同市场一致的原则。结构转型主要由企业根据变化的市场条件自主调整，政府扶持只起辅助性作用。(3)以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结构转型，以结构优化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协调，以集约发展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以科技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建设创新性国家。(4)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环保优先，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同步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步考核，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欧盟于1995年出台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暗含如下一条规则：今后欧中双方若在经贸、人权等方面出现摩擦，主要由欧盟出面解决，欧盟成员国只需负责围绕纯经济利益的具体谈判。这条规则至今仍然适用。与会者普遍认为，应对欧盟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更加深入而细微的研究，这对中国发展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贸往来非常必要。

三、德国外交：政策与角色定位

关于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外交政策，有些与会者认为有如下重点和特点：更加强调国际合作和联合国的作用，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位；更加依托欧盟，努力使德国利益与欧盟利益保持一致，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更多地从欧盟角度出发，积极推动欧盟一体化；重建跨大西洋友谊，密切德美关系；提出“责任论”，以吸引新兴国家；更加重视围绕能源、气候和非洲等问题的新型国际问题；更加注重价值和人权因素，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着力提升德国的国

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德国驻华大使的报告具体阐述了德国的“前瞻性外交政策”，声称这是德国政府为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而提出的一种可持续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实行长期稳定的邻国政策，妥当处理欧盟与其近邻(如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2)在中东地区既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又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继续保持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帮助阿政府加强维护本国安全的能力；密切关注对欧盟安全构成挑战的伊朗核计划的发展。(3)重视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将环保问题置于战略安全高度予以考虑。

德国对自己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角色的定位也在发生微调。2007年，德国开始兼任欧盟和“八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与会者普遍认为，德国积极利用这一角色，在推动欧洲一体化和协调全球事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的影响力正在全面上升。

作为区域大国的德国与超级大国美国有着战略利益方面的分歧，德国不会甘当美国的北约“万能工具箱”里的一件工具。鉴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德军暴露出的军力不足等问题，德国在2001年开始取消旧有的陆海空三军建制，使联邦国防军向以“轻装、机动、快速反应”为特征的“国际干预力量”转型，希望借此在军事上发挥与其地位相符的作用。

针对德国的上述调整与变化，有学者发问道：德国的思想深处是否还潜伏着帝国梦？德国还会重蹈覆辙吗？有学者认为，由于传统思维以及二战后被极度压抑的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即便在形式上不会完全走老路，但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时候以另外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雄心。另有学者认为，德国不会走“老路”，对此绝对可以放心，因为存在着法律、政治制度、媒体监督、政治精英、国际机制等方面的保障，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德国市民社会的保障。

编辑：梅然　　审校：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网址：www.c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